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社科项目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大盆地生命的记忆

——巴蜀文化与文学

邓经武 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 / 邓经武著 .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81094-917-9

. 大 邓 巴蜀文化 研究 文学
史 研究 四川省 IV. K871.34 I 209.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3915 号

大盆地生命的记忆

——巴蜀文化与文学

邓经武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邮编：610054)
责任编辑 辜守义
发 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1094 - 917 -9/G · 212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028)83201495 邮编：610054。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全球化浪潮荡激下中国文化的坚守和再造，主要以人类文化学、地域文化学的视角，梳理巴蜀大盆地生命产生以来，在物质、精神创造上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征，并于中揭示大盆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生命记忆，同时把巴蜀文化文学历程中一些重要时段和重大现象置于当时全国乃至世界格局中去透视，从考古、历史、艺术、民俗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揭示文学的发生发展诸多动态原因，透视人类精神活动及其外化表现的一些规律，以此思考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构和未来发展的问题。

目 录

绪论：世界与国家视野中的地域文化与文学	1
第一节 文化与地域文化	1
第二节 南北文化与地域风习	9
第三节 巴蜀文学的界定	16
第一章 巴蜀文学的生成和流布空间	26
第一节 天府“大盆地”	26
第二节 久远生命史的记忆	29
第三节 巴蜀审美文化	35
第四节 地域人文性格	39
第五节 精神和物质的文化积淀	44
小结	49
第二章 巴蜀文学的发生	50
第一节 原始神话	50
第二节 巴蜀神话的地域特征	55
第三节 原始歌谣	62
小结	66
第三章 巴蜀文学的崛起：大汉声威的代言人	68
第一节 秦汉代移和文化融汇	68
第二节 大汉鼎盛精神的号手：司马相如	75
第三节 西道圣人：扬雄的创作	86



第四节	别体创新实验：王褒	96
第五节	汉代其他巴蜀作家	101
小结	105
第四章	魏晋时期的巴蜀文学	107
第一节	魏晋思潮与巴蜀人生	107
第二节	坚守个性的巴蜀文学	113
第三节	史传文学的兴盛	118
第四节	魏晋文学的巴蜀情结	120
小结	126
第五章	盛唐华章：巴蜀文学的辉煌	127
第一节	盛唐气象与巴蜀的狂歌诗史	127
第二节	唐代文学的奠基人：陈子昂	132
第三节	时代文学的巅峰：李白的浪漫狂歌	140
第四节	天下诗人皆入蜀：杜甫等的感悟巴蜀	147
第五节	大盆地之花：巴蜀诗人群	166
小结	174
第六章	花间丽词：中国文学的体式创新	176
第一节	“花间词”的产生	176
第二节	宫词文学的创新	183
第三节	“花间派”代表词人	187
第四节	“花间词”的艺术特色	192
第五节	“花间词”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197
小结	201
第七章	两宋睿智与巴蜀文学	202
第一节	蜀人与蜀学	202
第二节	旷世全才苏轼	213

第三节 蜀中文人何其多	219
第四节 入蜀作家的创作	234
小结	245
第八章 元明清文学	249
第一节 元代文坛“蔓草凄迷”中的巴蜀文学	249
第二节 明代巴蜀文学	264
第三节 清代巴蜀文学	281
第九章 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巴蜀文学	297
第一节 从死水微澜到风云初起	297
第二节 敢为人先的文学新潮	302
第三节 世纪骄子郭沫若	311
第四节 封建礼教的批判者巴金	317
第五节 大盆地人生的绘写者李劫人	323
第六节 农民诗人沙汀	328
第七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蜀作家群	335
小结 现代巴蜀文学的价值	347
第十章 政治与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巴蜀文学	350
第一节 政治强权下的艰难转型	350
第二节 大盆地农村生活的歌手	359
第三节 巴蜀怪杰魏明伦	369
第四节 巴蜀新生代诗群	375
第五节 行进中的巴蜀文学	382
小结	386
跋	387
参考文献	390

绪论：世界与国家视野中的 地域文化与文学

第一节 文化与地域文化

文学是一种文化形态，是在特定而具体的土壤中发生发展和运行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生存的精神形态以具象方式的反映。在论题正式展开之前，我们先从文化（culture）说起。

“文”，本义为各色交错的纹理。《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涉及“文化”含义的是《易经》。《易·系辞·下》曰：“物相杂，固曰文”，意指事物的构成、结构纹理形态和彼此关系等，又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就已经把有关含意讲得比较清楚了。《庄子·天道》引：“老聃曰：‘土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又引“巫咸曰：‘天有六常，帝王顺之则治’”，以人类群体某种组合关系、秩序和价值观念之“文”（其中当然地包含了“天地常理”等规律性的东西）去“教化”、规范社会，就是“文化”，即如《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这里，



其实已经包含着 20 世纪后期西方学者关于“文化是一个动词”的思想；较早地把“文化”作为一个专用术语使用的是《文选·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化”，这是从人类精神层面给予强调的。后来又出现了与“文化”相联系的“文明”，《尚书·舜典》（唐·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文化”分解为“文治”与“教化”，不能以“文”教化的对象，就是冥顽难驯的蛮夷，是谓“化外之人”。西汉的刘向说：“圣人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有“文”，并因为有“文”而不断地“化”美、“化”善，使自身日益趋于完美。文化不仅是一种在自然人本体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之本体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地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文明是文化的结果，是文化的价值判断所在。人无“文”则无“化”，无“文化”，则无“文明”。

在西方，Culture 本于拉丁语 Cultura，（耕种、居住、练习、注意），英、法语中意为栽培、种植，引申为对人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汉字的“文化”偏重于精神范畴，英语的 Culture 却立足于物质生产活动，更类似于中国汉字的“文明”（civilization）词义，它指精耕农业技术带来的开化、教化和社会的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的社会化、秩序化。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在《原始文化》（1871 年）中提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近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开始从科学理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化”问题。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提出：“文化者，人类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刘向·《说苑·指武》

梁启超的定义，高度概况却过于简略，泰勒对文化的定义偏重于精神形态而忽略了文化的物质形态。在中外学者提出的有关“文化”的上千种定义中，我们还是认同《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文化”的解说：“人类社会由野蛮至于文明，其努力所得成绩，表现于各方面，如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学术、思想、风俗、习惯、器用、制度等，其综合体，则谓之文化”。即：文化就是“人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全部总和以及所达到的程度和力量。人的生命历程，就是在特定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一切先决条件中，从动物人逐渐发展为社会人，并进而成为文明人的文化发展历程，因此人们常言：“人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的符号”。

文化是有国界、民族之分的，区分的标准应该是其特色是否鲜明、个性是否突出，关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分，实际上是将“文化”中的政治、制度、经济、科技等某些具体层面上升为整个文化范畴(category)，犯了个别代替整体的逻辑错误。比如我们把封建文化视为落后、反动的文化，就是从其政治的专制、扼杀人性等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来说的。人创造了文化，人更是文化的产物，对文化，我们更强调人文精神层面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它是民族的历史、心理、审美情趣乃至包括民族地域特点在内的世代相传的血脉。对人类文明或人类文化的判断，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人是区别动物人的根本标准，社会的建构和形成，是人类走进文明时代的标志，因此人又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又是社会的奴隶，人要在社会中才能生存，要追求无限幸福，却被种种伦理道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精神枷锁束缚。而且，在特定的阶段一部分人往往被异化为非人，不被同类当作人。因此人要探寻社会组合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



探索人与社会关系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正、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社会解放就是使所有的人作为社会人都能够获得人的资格，获得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个性最大化实现。无论中外，人类历史在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往往都是以人文主义精神的高扬和思想解放为旗帜的。

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是人衡量一切的价值尺度。在人文文化中，人文精神是核心的东西，它是人文文化的精神理念，是人文知识、人文素质的内化和升华。它不只是个人的理想或修养，也常常是民族和地域人文精神的具象化体现，而且还是一种终极关怀，是生命价值、精神价值的追求与体现，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取向。如果用黑格尔《历史哲学》所概括的“绝对精神”来说，这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向必然、无限、绝对靠拢”、追求人的自我主体全面实现的动因。一个有作为的人，一个有活力的民族，都有自己已经形成的优秀的人文精神传统，否则这个民族就必然消亡。应该看到，随着当今世界激烈的经济竞争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地位竞争，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他们在世界赖以生存和独立的根本。所以，努力发展民族的精神文化使世界呈现多元色彩，以之彰显自己的存在和独立性，就是我们明智的选择。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萌生、运行和发展于一个特定地域空间中的。

我们所说的地域（region）是指文化学意义上的空间范畴，既包括历时性的文化流布，也包括共时性的空间蔓延及其与外部异质文化碰撞化合。它的边界呈弥漫状态而非清晰的，是不很确定的，因为文化的辐射从中心由强到弱至边缘（brim），其界线常常不很明显，特别是伴随着一个地域性政权在政治、军事、经济

方面势力的扩展或收缩，这种地域文化辐射的范围也常常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例如扬雄在《方言》中就把巴、蜀、汉中划为一个方言文化区；但也可以是很确定的区域（area），如行政（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的划分，这又具有政治地理学色彩。就文化的运行、流布而言，我们不使用“地区文化”“区域文化”这样的术语，正是为了强调其常常突破行政边界的弥漫性特点。

我们对“地域”的认识，首先是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它是先于人类存在原初性（original）的，是在生命史开始之前，就由地球表层地貌以及相应的气候条件，作用于自然景观变化而形成的决定着一切的先决条件，它对于生产水平非常低下，经济极端落后的上古先民们影响最大，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其生产劳作的形式、生活方式的取向。在这种前提下，原初时期人类——刚刚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童年人类的意识、思维，在形成之际就被烙上自然客体的深深印痕，这种印痕又导引着人们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方向，模塑着人们的创造特点，并且一代代地传递、凝聚、固化和积淀下来，成为一种传统、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环境和人文氛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二自然”。也就是说，人类开始成为“人”时的意识初萌以及由之积淀而来的“童年记忆”，既是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源头，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被不断地积淀、固化为习惯、习俗、特有的生产模式和生存模式以及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影响制约着人类后来的一切创造活动，直到当下。

人类是在既有的自然条件下开始着生存搏击的，辽阔的内陆平川使生息于其中的人群选择了农耕，亚热带多水气候又为稻作文明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高原地理气候和植物生长状况使人们只得游牧的方式获取生存资源；辽阔的大海诱导着濒海居民去远航捕捞。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其居民的求食形式，人的生产方式



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以及由之而来的价值心理和道德准则等，这就构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无论是内隐形态的精神层面，还是外显形态的物质层面，这种文化都带着其生存空间浓郁的自然印记——文化的地域特征就由兹而具。

疆域辽阔的华夏大地具有繁复多样的地理地貌，中华民族在童年时代，以一个个相对聚居的群落，开始繁衍生息，再逐渐整合为部落、氏族。《战国策》云：“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以之为轴心，在特有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以及由之而来的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等基础上，逐渐形成相应的社会制度。《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各因所生”所强调的，正是地域的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先决条件。随着人类的社会化进程，一个个方国开始形成，“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是众多地域性的方国林立，即我们今天仍然耳熟能详的齐、鲁、燕、赵、秦、晋、楚、吴、越、巴、蜀、岭南、朔方等，呈现为多元轴心的社会构成形态。

一个方国，是在相应的地域范围中，因为大致相同的地理地貌、自然植被、气候物产以及相应的生存和生产劳作方式，还有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民俗风习、价值观念等同质性因素为基础形成的，并且有着该方国人文精神凝聚点的化合作用。《礼·王制篇》：“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其地域人文精神已经鲜明呈现。如较早步入农业文明而又濒临大海的齐国，就呈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貌，齐桓公称霸这一政治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是有着深刻的地域人文精神的原因，“蹈海鲁连不帝秦”，以及“兵家”盛行和“稷下学派”的辉煌，“泱泱大国”之士，岂能甘心做“西僻”之秦的顺民？此亦可佐证；鲁之“未能事人，焉能食鬼”（《论语》）。

鲁国闵子马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的世界观，是儒家“仁学”思想发展的基点，“大国”流风所及，至圣、亚圣的相继问世以及当时的两大显学儒、墨（墨子虽然担任过宋国大夫，实为鲁人）都诞生于之等等，都应该有着该地域人文精神氛围的特殊涵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的文化传统，使武丁可以假托梦中神人示意、借助于神的旨意以避免大臣们的反对，从囚徒中选拔傅说为相来治理国家，而“唯殷先人，有典有册”的文化风尚，应该就是“殷墟”出土甲骨文遗物众多的原因之一；荆楚地区峰峦叠翠、碧水沉潭、云遮雾绕的秀美山川，才能够激发人的浪漫想像，才能够产生屈原一类伟大诗人。巴蜀远古生态环境是：“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居，此草也，冬夏不死”。可以说，当北方民族还在辗转迁徙，寻找一个合适的生存环境，还辛苦搏击于“载燿载烈”、“如火烈烈”的严酷自然中（如《诗经》中“公刘”、“生民”所叙），当湘楚部族尚在“芰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荆棘丛中艰难垦殖时，巴蜀人已通过“先民之诗”如此夸耀着自己优裕的物质人生：“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为阜丘，彼稷多有，旨酒嘉谷，可以养母”。这种自给自足、自成单元的大盆地物产优势，养成巴蜀地域人文精神“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蔑视中央权威和正统礼法规范，总是以各种形式进行反叛的地域文化性格。

我们不妨来作个案分析。

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分封于“唐”，叔虞之子后来将之改称“晋”，

《山海经·海内经》

《华阳国志·巴志》

《汉书·地理志》



其开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晋居深山，戎狄之为邻”，“深山”恶劣的自然条件，“为邻”的游牧民族来犯掠夺时常发生，这块土地又是“夏”族的旧都所在——《左传》有言：“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生活于夏朝旧墟上的遗民冥顽难驯，这种特定的社会构成和比邻关系，使统治者不得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以迎合当地特有的民间习惯和心理定势。就自然条件来说，贫瘠的黄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农耕文明发展极度缓慢，物产的不足，使“晋人宿崇功利”，一切都要求立足实际。古三晋地区盛行《韩非子》、《竹书记年》等学说，就是这种地域人文心理的折射。《毛诗序》称：“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今人则对之解说明：“在三晋，诞生了法家学说，强调法制而力主耕战，就青铜器的装饰而言，表现等级差别的礼仪活动，正是流行的图像题材”。一方面，是自然环境的恶劣，物产的匮乏，“俭”的提出，就基于尽可能节约地利用已有资源来维持人们的生存必需。但这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生存资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每个人生存的迫切需要使人际关系变得紧张，剧烈生存竞争的蕴蓄激化（如“三家分晋”、“戎狄之为邻”的掠食），就爆发为频繁战争。“力主耕战”学说在该地域盛行不衰，正是人们希望增大生活资料生产（耕）的同时，再以掠夺（战）其他族群的财富以供己用。“耕”之不足，转而求诸“战”，是有该地域“民风剽悍”之谓，如饱尝“险阻艰难”的晋文公为改变生存条件而进行“城濮之战”进而称霸中原、摆脱“居深山”之困境；另一方面，战争必须以耗费更大的人力物力为代价，交战双方只得再求诸于“礼”，以契约方式来协调人际关系以

《左传》

俞伟超语。见《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东南文化》1990年3期

达到社会安定。努力建构社会政治秩序，强调按等级来进行的财富分配等“用礼”思想，就成为该地域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南北文化与地域风习

中国地理疆域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干旱多风沙，南方湿润多雨水，地貌景观差异极大。长期受自然地貌景观涵蕴的人，对其所居之地便有了深切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形成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性格、心理、气质、审美价值趋向及呈现出特有的民俗风情等。人类群体的生产生活，或者说政治、军事、文化等活动，总是根植于一定的、大小不等的地域范围内。山脉绵延的走势、河道蜿蜒的形状，湖泊的形制，以及地貌裸露的色泽和自然植被的呈现，都是“十里不同天”的，与之相应的就是“百里不同风”——它们的人文环境、社会历史生成条件和民风土俗的诸般差异，是不言自明的客观现象，后来的行政区划也往往以之为界标。对此，古代学者早有认识，《孟子·尽心》说：“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也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等，都道出了所“居”的地理自然环境“大哉”于人之精神的关系。可以说，历经传承而成为一种在人的潜意识深处起着作用的“积靡”，既是中国文化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也是先秦时期各方国文化互相碰撞“百家争鸣”的自然结果。“季札观风”、《诗经》对“十五国风”的划分，都是

《赵树理文化模式的当代思考》，《第四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晋东南师专学报》2001年4期
《荀子·儒效》



中国文化较早注意到地域文化彼此差异的例子。

到汉代，中华民族真正开始进入文化的大一统阶段，各方国文化的差异性才在时代提供的同一平台上表现出来，即所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这就为中华民族的融汇化合提供了可能。如司马迁“20岁后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还曾出使巴、蜀、邛、笮、昆明，并随汉武帝四处巡幸”，各方国文化典籍的汇聚给他的阅读提供了条件，四方游历的切身感受和真实体验，使司马迁能够从平行比较的角度去论述各地域文化的不同特征。《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大王、王季在岐，文王在酆，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狃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巴、蜀亦沃野，地饶扈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僊，僊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等。他依次分析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经济发展、风习民俗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对后世文化学术思想及文学的内容形式表现，产生或隐或显、轻重不等的影响。

东汉班固已经显现出地域文化思维的端倪，《汉书·地理志》论述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

《史记·货殖列传》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208页

· 10 ·

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他分别看到：“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公刘处豳，大王徙文王作郿，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故此数郡，民俗质朴，不耻寇盗”，又接着述说《诗·国风》中邶、庸、卫、郑等国之诗的题材内容、风貌特征与形成原因，以及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风尚习气。他还说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牦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两汉史学家关于地理、物产与人文风习等的论说，已经成为当下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引证最多的内容。

真正对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有自觉意识的，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永嘉之乱，晋人南渡，大批北方文人流连于以建康为中心的会稽、温州、九江等地，对峰峦叠翠、碧水沉潭、云遮雾绕的秀美山川等自然景貌，形成一种“陌生化”的心理震惊。人们常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和当时人们的山水审美情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南山水的独特风貌所给予“南迁北人”那强烈的